

东北沦陷时期朝鲜移民文学与东北作家群文学 生成比较研究*

邱峰, 权赫律

(吉林大学外国语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 1930年代是中国东北朝鲜移民文坛和东北作家群逐渐形成的时期,两个文学群体在“跨地域的移居体验”“文学传统的传承”和“舶来文化的接受”上存在相似性,二者都是在经过生成的阵痛之后降生为移居者的民族文学。二者相似的时代背景和作家相似的跨地域移居经历产生了相似的文学,在相似性中,又因两国各自民族的文学传统和跨地域移居后处境的不同而产生了文学群体文学生成的不同。

关键词: 东北沦陷时期; 朝鲜移民文学; 东北作家群; 文学生成

中图分类号: I31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722X(2022)05-0153-07

0. 引言

1910年前后的“在中国的朝鲜^①文人文学”主要由流亡至中国的政治运动家兼文人创作,具体有流亡上海的金泽荣、申桎、柳子明,流亡东北的申采浩、金大洛等。直至1920年代末,“移民至中国的朝鲜人文学形成了以在太行山区的朝鲜义勇军、关内的光复军以及在中国东北戎马倥偬的抗日联军的武装斗争为中心”(전성호 외 2007: 105)的抗日文学。1930年代初期,中国东北的朝鲜移民文学^②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气势,并以龙井为中心开设了名为“北乡会”(북향회)的文学团体。朝鲜移民作家本着“当地主义”(현지주의)的态度,逐渐成长为当时朝鲜文学的一个分支,在时代潮流和大势下,从流亡文学逐渐过渡到移民文学。

东北地区曾是清代王朝皇亲国戚的封禁地,欠发达、未开发的文化处女地与林海雪原遥相呼应,缺乏文学积淀。然而,1920年1月,沈阳的《盛京时报》首开先河刊登关内颇负盛名作家的作品,具体有胡适的《归家》和罗家伦的《雪》等新诗作品。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东北文学呈现出一定的繁荣景象,出现了许多或知名或无名作者创作的长篇小说和新诗,1931年前后,逐渐形成了以罗烽、舒群、萧军和萧红为代表的哈尔滨作者群。“九一八”事变后,在东北作家群尚未移居至关内时,他们通过东北地区的文学杂志开展文学活动,借助象征手法表达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反抗。在1930年代后半期东北作家群陆续移入山海关之后,他们在关内积极开展抗日文学活动。

东北沦陷时期^③朝鲜移民文学和东北作家群^④文学二者在文化身份上具有多样性,作品都

收稿日期: 2022-04-14; 作者修订: 2022-07-12; 本刊修订: 2022-07-20

作者信息: 邱峰(1987-),女,吉林松原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韩国现代文学和中韩比较文学, E-mail: qiufengchangchun@163.com; 权赫律(1965-),男,朝鲜族,吉林磐石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韩国现代文学和中韩比较文学, E-mail: quansh21@163.com。

具有复杂的背景：第一，两个作家群的形成时间都是在 1930 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殖民统治的时期，二者都有被殖民的经历。第二，两个作家群都离开故乡，选择了跨地域的移居。朝鲜移民作家从朝鲜半岛移居到中国东北，东北作家群从东北移居到关内，二者都因“跨界”^⑥体验做出了跨界书写。第三，朝鲜移民作家在东北这一地理空间中创作出了关于东北生活的作品，东北作家群移居到关内后创作了关于东北故土家园的作品，二者的文学艺术空间都是中国东北。上述两个作家群文学创作背景的相似性构成了二者文学的相似性。

1. 跨地域的移居体验

1.1 半岛作家移民中国东北的动机考察

日本帝国主义者把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推上宝座，成立了伪政府，并向全世界昭示其所谓的独立地位。日本帝国主义为向世界标榜伪政府的独立性而实施了一系列的举措——废除治外法权以及炮制国籍法等，这与 1910 年日本帝国主义对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手段截然不同（金在湧 2013：195），在东北成立伪政府，这是日本对国际政治舆论和国际殖民形势综合考虑后策划的方案，即以貌似独立国家的形态脱离国民党政府的统治。日本帝国主义建立伪政府是顺应国际殖民化的新趋势，其实质是新帝国主义思想。新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由简单粗暴变成复杂隐蔽，在统治制度的表层赋予沦陷区被殖民地民族独立性和自治权，在虚幻的表象背后实质是迂回地控制了沦陷区人民。

之前日本在强行吞并朝鲜半岛后，对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采取的是完全不同的政策。半岛内的朝鲜人都从根本上被日本操纵，失去了主权和自由。在朝鲜半岛，日本殖民统治者通过民族同化政策推动所谓的“内鲜一体”理念，该政策涉及到各方面。截至 1938 年，朝鲜半岛在日本强行实施的日语同化教育环境中，已沦为极度殖民化的境地，朝鲜语的教育被迫完全废止。1940 年代，日本对朝鲜半岛的殖民化进展呈螺旋式上升节奏，朝鲜半岛本土民俗文化的活动范围极度缩小，一部分朝鲜民族主义者或选择静默消沉或有所改变。因此，“在逐步升级的日本殖民压迫之下，部分朝鲜人或为求生存，或为谋发展，或为躲避兵役，或为开展朝鲜民族独立运动，陆续移居近邻中国、苏联及宗主国日本”（张泉 2017：129）。

1930—1940 年间，朝鲜文人移居中国东北和朝鲜移民文学的精神追求并非巧合，而是在躲避“内鲜一体”而求“五族协和”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情境下激发的必然结果。金在湧（2013：197）指出，廉想涉和白石前往东北伪政府是朝鲜人为坚持自我民族身份，躲避“内鲜一体”的政策压制而逃入“五族协和”统治区域的一种行为。虽然不能说移居到中国东北的全部朝鲜作家都是持有相同心理，但其中的部分作家确实是为了逃避半岛更加严酷的殖民统治。

1.2 东北作家移居关内的路线踪迹

东北作家群的整体形成是由于失乡者寻求家乡的内部力量，是在流动性、自愿性的作用下形成的不稳定、无组织和开放的系统。东北沦陷时期跨地域的东北作家群成员由上海、北平和青岛的第三批人组成，每个地区都相对独立，它们各自形成了一个子系统。（沈卫威 1992：10）“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侵略者的恶魔之手关闭了山海关，之前已迁往关内的东北文艺青年很快就变成了流离失所的流浪者，他们首先开始创作出表露失乡者心声的作品。在上海，他们开创了以穆木天、李辉英为先导的抗日文学艺术。李辉英的《最后一课》和《万宝山》成为反日爱国小说的嚆矢。活跃在北平的东北作家代表有端木蕻良和马加，两人都是北

方“左联”的主要成员,分别写出了反映东北生活的作品《科尔沁旗草原》和《登基前后》。

青岛是在东北作家群文学史上占有中继点和节点地位的地方。1934年,东北处于日本法西斯的高压形态之下,此时的东北文学举步维艰。先是作家舒群迁往青岛,然后又催促萧军、萧红南迁。在青岛的监狱里舒群创作了《没有祖国的孩子》,成为了传递东北作家国际主义大义和表达东北沦陷区人民心境的典范。青岛不仅让萧军与萧红写出了失乡者文学的最强力量——《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更是“二萧”与“左翼”作家领袖鲁迅进行交流的发端。

李辉英通过创作《最后一课》和《万宝山》传达出了一个信息,即上海的创作空间相对宽松和自由,讨论东北生活的作品能够生存。1935年,萧军和萧红去往上海,师从鲁迅,使其作品《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得以发表在《奴隶丛书》中,与李辉英的《万宝山》形成合力,造成了文坛上的震荡,从而确立了东北作家群的地位和名声。此时,流落青岛的舒群、在北平的端木蕻良以及在哈尔滨的罗烽、白朗和骆宾基于1936年南下上海,与上海的穆木天、李辉英相见,实现了东北作家群的汇合。但好景不长,1937年,侵华日军在上海发动“八一三”事变,随后淞沪会战爆发,群聚上海的东北作家被迫迁往其他地区。在1941年前后,几经辗转,许多东北作家再次获得相对的安定。分布在延安、香港和桂林三地的东北作家保持这种三点局面直至战争结束。

2. 文学传统的传承

2.1 朝鲜移民文坛:朝鲜半岛国内文学的延伸

1930年代,近代朝鲜半岛文学可以分为1894—1909年的开化新文学期、1910—1918年的启蒙期、1919—1923年的民族主义期、1923—1925年的新倾向派期以及1926—1935年的无产阶级文学期。“因为阶级立场和方法论不同,民族主义阵营的作家和新倾向派作家对立,但实际上二者的文学都属于忠实反映现实的现实主义文学范畴。”(金英今 2009: 143) 1930年代中期,日本强烈打压朝鲜半岛无产阶级文学潮流,先后于1931年和1934年两次捕获“卡普”^⑥(카프)人士,以组织为导向的普罗文学受到了极度的制约。1935年“卡普”被日帝瓦解后,“给卡普文人一个喘息的机会是在1934年苏维埃作家大会上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古典文学理论。”(임환모 1992: 22)现实主义贯穿于1920—1930年代的朝鲜半岛文坛。

现实主义文论是东北沦陷时期朝鲜移民作家推崇的公共文学观,认为文学源于现实、是现实的写照,文学必须忠实于现实。他们主张,朝鲜移民的思想是移民文学的第一要素,移民文学是生活在中国东北的朝鲜移民情感和生活的镜像。1940年,《满鲜日报》为募集在中国东北的朝鲜作家的观点,展开了有关“满洲朝鲜文学建设新提议”的纸上讨论,登载了众多朝鲜移民作家的文章。其中,金贵强调中国东北的朝鲜文学应当是“农民文学”,同时又以“现实主义”提出了“大陆农民的创造精神”(전성호 외 2007: 156)。申曙野也强调“文学是这个时代的真实反映”(전성호 외 2007: 156),朴荣濬称“有生活的地方不可能没有文学”,并主张要书写在中国东北的朝鲜人的生活(전성호 외 2007: 156),黄健强调“满洲的朝鲜人文学必须扎根满洲这块土地”(전성호 외 2007: 156)。这说明,“文学生发于现实”这一真理可以作为1940年代朝鲜移民文学中最基本的议题。

关于中国东北的形象,这些移民作家的认知并未有悖于中国东北的现实,即中国东北虽

然土地肥沃，但却是有待开发的处女地。在实现中国东北形象的文学化塑造时，必须要了解和认识中国东北的现实。如果对其特点体悟得不充沛，对其文化形象的认识有失偏颇，就会失去中国东北的文学特色。而朝鲜移民文学恰如其分地映射了中国东北的现实意象，同朝鲜半岛的现实主义文学保持步调一致。

2.2 关内文坛中的东北作家群流派：对民族文学的继承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人民的影响首先就是启蒙。“五四”文学革命的首发阵地《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的引领者“随感录”作家群大多有着对生活的批判态度。“五四”新文学团体“创造社”的作品也以很具有辨识度的风格凸显了对现实社会生活的追求和思索。在中国文学史上，从“五四”文学开始才有了表达个体个性的渠道。“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作品都充满了反帝反封建的内涵和气势磅礴的历史色彩，其特点是刻画被压迫阶级的苦难和反抗，在新的文学中体现出与旧民主主义文学相异的格局。

在国难当头的时代，萧红的《生死场》和《呼兰河传》敲响了社会历史的警钟，符合“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鲁迅所开创的改造国民性的文化价值取向，在贫穷落后、封建礼俗和日本帝国主义者摧残的社会背景下，直击阻碍社会发展的国民灵魂，给萎靡的人道主义和民族主义敲响了警钟。

在《呼兰河传》中，通过小团圆媳妇这一人物形象，也反映出萧红提倡个性张扬的文学主张。小团圆媳妇没有被塑造成传统的童养媳那样羞涩、胆小、不懂得反抗的形象，而是大方随性，“见人一点也不知道羞”，“头一天来到婆家，吃饭就吃三碗”，见人“笑呵呵”的，“大模大样的，两个眼睛骨碌骨碌地转”，懂得反抗，“嘴也是特别硬，我一打她，她就说她要回家”（萧红 2016：94、95、103），喜怒形于色，而她的这种表现被她的婆婆看成是有违体统，小团圆媳妇最终在封建礼教的苛责下成了牺牲品。端木蕻良在颓废之时收到鲁迅的信后大获鼓舞，以瀑布倾泻之势写出了《科尔沁草原》。作品的主人公丁宁在南方学习过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接受过新思潮的影响，意识中打下了“五四”启蒙思想的根基。

综上所述，两个作家群的文学都继承了各自民族的文学传统，都从民族母体中汲取了养分。朝鲜移民作家是对创作方法的传承，东北作家群是对思想的继承。在朝鲜半岛，引领 1920—1930 年代文坛潮流的流派就是现实主义文学，朝鲜移民文学延续了现实主义的脉络，成为朝鲜半岛国内文学的延伸。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使得中国整个文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具有深刻的爱国主义情怀和人文主义关怀的东北作家群深受影响，他们接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在鲁迅的影响下，成为中国“左联”文学传统的践行者。

3. 舶来文化的接受

3.1 朝鲜移民作家对俄罗斯文学和中国文学的接受

安寿吉于 1936 年在杂志《北乡》(북향)第 2 辑中发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恶灵〉》(떠스더이에프스키의「惡靈」)的评论。安寿吉在文中表明几年前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当时虽然只读了一半，但此次重读后感触颇深。(안수길 1936a: 4-7)安寿吉一生接触的俄罗斯文学主要有《罪与罚》、《白痴》和《恶灵》，虽然安寿吉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人物印象深刻，但对他的学习却不是盲从的，是有选择性的。安寿吉主张吸取和抛弃同时进行的“扬弃”态度，在《北乡》第 3 辑中称：“应当最大限度地继承他的手法，批判地接受他的思想”

(안수길 1936b: 26), 这显然是他接受外来文化时最明确的态度和眼光。

玄卿骏对俄罗斯文学的接受要追溯到其生活在朝鲜半岛的时期。玄卿骏在朝鲜国内接受的是社会主义教育, 他就读于朝鲜的名校镜城高普, 该校拥有接受了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的众多教师, 学生们也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受当时朝鲜半岛内时代潮流的影响, 玄卿骏 19 岁时从镜城高普退学, 1927 年跟随父母前往已经取得十月革命成功的俄罗斯。受俄罗斯文学的浸润, 玄卿骏习得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论。当玄卿骏回到朝鲜后, 在 1935 年“卡普”解体这样残酷的社会现实中, 他不断发表具有反抗意志的小说, 倡导自己的创作方法论。随后, 在他前往中国东北后的创作中也未曾脱离俄罗斯文学的影响, 他在一系列论述中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俄罗斯作品为例进行文学探讨。

黄健在《满洲朝鲜人文学的特殊性》中指出, “伟大的理念、哲理、灵感, 只有在伟大的生活、生命中发掘, 才能成就真正的伟大。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歌德的伟大就在于此。他们的精神之洪流, ……因为他们曾经体验过伟大的生活, 发现和创造了伟大的人性” (黄健 2017: 439)。由此可见, 黄健钦佩托尔斯泰等伟大作家们通过不同寻常的伟大生活发掘出伟大的人性, 感鸣于俄罗斯伟大作家的先导之力。

朝鲜移民文学对中国文学的接受主要表现为对鲁迅文学的接受。安寿吉译介了鲁迅的《故乡》, 并于 1935 年发表在中国东北的朝鲜人的首个也是唯一一个纯文学杂志《北乡》的创刊号中。安寿吉称自己对世界文学名著的热爱已达到中毒的程度, 日本的“岩波文库”是具有权威性的、收录世界名著的丛书, 《故乡》被收录在“岩波文库”中。据推测, 安寿吉是通过“岩波文库”接触到鲁迅的《故乡》的 (金长善 2017: 62), 他深感其艺术价值的伟大, 将译作发表在《北乡》上, 旨在将这篇小说作为典范推广至广大的朝鲜民族之中。

3.2 东北作家群对俄罗斯文学和法国文学的模仿

1930 年代初, 因地理位置毗邻的关系, 哈尔滨作家群接触和引进了包括俄罗斯文学在内的外国文学著作。在东北作家群的作品中, 与俄罗斯文学关系最为密切的作品要属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对萧军作品与俄罗斯文学的亲缘关系, 早在 1935 年文学巨匠鲁迅和著名评论家刘西渭 (李健吾) 就曾有过明确的评价。鲁迅指出: “《八月的乡村》, 即是很好的一部, ……结构和描写人物的手段, 也不能比法捷耶夫的《毁灭》” (萧军 2016: 195)。刘西渭言道: “《毁灭》给了一个榜样。萧军先生有经验, 有力量, ……参照法捷耶夫的主旨和结构, 他开始他的《八月的乡村》” (萧军 2016: 281)。

骆宾基在《复宫尾正树先生的信》中曾表露出自己读了多部俄罗斯和法国的文学名著及其对自身创作的影响。从端木蕻良在《我的创作经验》中谈到的对托尔斯泰的叙事中可以看出, 端木蕻良不仅读了他的作品, 还读过他的回忆录。端木蕻良对托尔斯泰十分了解, 特别是对形成其创作灵感和源泉的家族历史谙熟于心。萧红主要受到俄罗斯和法国文学的深刻影响。在萧红尚未踏入文坛时, 她就对屠格涅夫的作品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在萧红的少量文学批评中, 体现了对屠格涅夫和罗曼罗兰的崇拜。她赞叹他们作品中渗出的诗意, 以及他们在表达灵魂时所投射的浓重的主观情感色彩, 萧红对这一点的借鉴主要反映在她作品中体现出的强烈的主观倾向。

李辉英的《最后一课》受到法国都德的名作《最后一课》的影响, 对其接受之后进行了

模仿,都以第一人称讲述了“我”的遭遇和行为。都德作品的时代背景为法国在经历过 1871 年普法战争的失败后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被分割给普鲁士的历史事件。李辉英的《最后一课》是一个爱国主义的抗日故事,背景为日本侵华、东三省沦陷的历史,以反帝反侵略为主题,表达了作者因故乡沦陷而无家可归的心境。作品中,中国东北的一所女子中学因侵华日军的占领停止运转,学生们意识到再次开学后日文课将代替中文课,将见不到中国的文字了。李辉英的小说也将主题命名为“课”,但大多数的活动范围都是警察局的拘留所,而不是学校。即使空间背景不是教室,但“课堂”教育的意义依然浓厚。李辉英的《最后一课》虽与都德的《最后一课》重名,但在故事设置和人物描绘上有很多的改造和创新。

由此可见,两个作家群作家都积极接受舶来文化,吸收借鉴世界文学的精华。朝鲜移民作家对俄罗斯作家和作品倍加推崇,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评论,对于鲁迅的作品则不局限于个别作家对作品的阅读接受,而是通过发表相关译作进行推广传播。而东北作家群对俄罗斯和法国作家的作品更多地是进行了超文性模仿,与原作之间构成互文。

4. 两个作家群文学生成比较研究的意义

东北沦陷时期的朝鲜移民文坛在经过黎明前的黑暗之后迎来了曙光。以《满鲜日报》为中心,掀起了朝鲜移民文学的高潮,以移民作家安寿吉、金昌杰、玄卿骏和朴荣濬为首,出现了文学作品集《萌芽的大地》《满洲诗人集》《在满朝鲜人诗人集》《北原》《满洲朝鲜文艺选》等,促成朝鲜民族在异域的文学成就。这不仅在中国朝鲜移民文学史上,在整个朝鲜文学史上都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

东北作家群虽然没有形成正式的组织,没有颁布统一的纲领,也没有同盟的宣言,但他们的作品体现了东北作家应对现实的果敢,通过各自的群体感知能力正确处理涉及到民族危亡的关键问题。东北作家群开创了抗日文学的精神谱系,唱响了时代的合唱奏鸣曲,形成了黑土地作家文学的鸣唱。

比较研究上述两个作家群文学的生成有着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首先,在各个版本的朝鲜-韩国文学史中,虽然有对安寿吉、姜敬爱、崔曙海、金昌杰和玄卿骏等作家的各自评价与介绍,但没有一个独立的章节是专门介绍朝鲜移民文学的,朝鲜移民文学还没有作为一个整体出现在朝鲜-韩国文学史中。而本文的比较对象东北作家群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没有获得作为一个作家群体应有的地位。因此,类似对比研究能够引起学界更为广泛的关注。

其次,两个作家群文学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日本侵略和抗日救国的内容,阅读和比较这类作品,可以促进读者对历史的了解,进一步激发当代人的爱国情怀。2021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卜杜勒扎克·古尔纳 (Abdulrazak Gurnah) 是一位关注殖民历史和身份认同的后殖民作家,这足以证明本文的研究对象——沦陷区被殖民民族文学是一个具有世界性的议题。

最后,当今的世界是全球化的世界,跨地域流动是现代人的常态。跨地域的流动需要对异域文化有所了解,文学是文化的载体之一,对两个作家群文学的考察可以帮助读者理解作家作品所蕴含的文化含义。透过作品对跨地域移居体验和思乡之愁的叙写,可以理解作者的创作心境和民族情怀,可以对经历了殖民统治的两国人的精神世界和文化产生共鸣。期待通过比较上述两国两个作家群文学的生成,扩大比较文学的对象范围,可以实现促进两国文化的交流和比较。

5. 结语

两个作家群文人作为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之下, 饱受压迫和剥削的两国民众的代言人, 书写了两国人民饱受磨难, 勾勒出两国人民坚强的民族精神以及坚决的抗争精神。比较文学是在不同的文学中寻找相同点的过程, 本文践行了比较文学“求同存异”的准则, 通过本文的研究, 说明了相似的时代背景和作家相似的跨地域移居经历会产生相似的文学。在相似性中, 又因两国各自的民族文学传统和跨地域移居后处境的不同而产生了文学群体文学生成的不同。

*衷心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修改建议和编辑老师的修改和建议!

注释:

- ① 本文中的“朝鲜”指朝鲜半岛, “半岛作家”指朝鲜半岛作家。
- ② 本文中的“朝鲜移民文学”指在东北沦陷时期前后从朝鲜半岛移民至中国东北的朝鲜作家创作的文学, 不包括此时移民至中国上海、北平等地的文人文学。
- ③ 东北沦陷时期是指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为止的东北沦陷时期。
- ④ 本文中的“东北作家群”指在东北沦陷前后从东北移居至关内的东北籍作家, 具体有萧红、萧军、舒群、骆宾基、端木蕻良、罗烽、李辉英等人。
- ⑤ 本文中的“跨界”指跨地域移居, 是地理空间的跨界, 不仅指在国家间的移居, 而且指在一国内部的移居、境内跨界。“跨界书写”指跨地域移居作家的文学创作。
- ⑥ 卡普: 朝鲜无产阶级艺术家同盟。

参考文献:

- [1] 黄健. 满洲朝鲜人文学的特殊性[C] // 崔一, 吴敏. 伪满洲国朝鲜作家作品集.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7: 439-440.
- [2] 金长善. 伪满洲国时期朝鲜人文学与中国文学比较研究[M].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7.
- [3] 金英今. 韩国文学简史[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9.
- [4] 金在湧. 东亚脉络下的在满朝鲜人文学[C] // 李海英, 李翔宇. 西方文明的冲击与近代东亚的转型. 青岛: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2013: 195-211.
- [5] 沈卫威. 东北流亡文学史论[M].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2.
- [6] 萧红. 呼兰河传[M].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6.
- [7] 萧军. 八月的乡村[M].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16.
- [8] 张泉. 殖民拓疆与文学离散——“满洲国”“满系”作家/文学的跨域流动[M].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7.
- [9] 안수길. 떠스더이에프스키의 「惡靈」[J]. 북향, 1936a, (2): 4-7.
- [10] 안수길. 「惡靈」에 대하여[J]. 북향, 1936b, (3): 26.
- [11] 임환모. 1930년대 한국문학비평 연구-김남천의 리얼리즘과 최재서의 모더니즘을 중심으로-[D]. 광주광역시: 전남대학교 박사학위논문, 1992.
- [12] 전성호, 립연, 윤윤진, 조일남. 중국조선족문학비평사 [M]. 북경: 민족출판사, 2007.

(责任编辑 田园丰)